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的渊源、贡献及其启示

钟国云^{1,2}

(1.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崇左 532200; 2. 中共中央党校 党建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经典论述,以及列宁根据俄国实际发展了的布尔什维克化建党理论,是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渊源。李大钊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大力介绍、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社会状况和斗争实际,对经典作家的建党理论进行灵活运用,进而成功地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探究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贡献,对于当前和今后思考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借鉴世界大党、老党的执政经验教训以推进自身建设等,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启示和现实借鉴价值。

关键词:李大钊;建党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8)02-0008-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8.02.002

The Origin, Contribution and Inspiration of Li Dazhao's Party-founding Theory of Marxism

ZHONG Guo-yun^{1,2}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s classical proletarian party building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olshevik's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by Lenin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reality wer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Li Dazhao's siniciz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arty building. In a national crisis in China, Li Dazhao vigorously introduced, studied and spread the thought of Marxism, combined it with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reality of struggle, flexibly applied the classic theories of party building and succeeded in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tribution of Li Dazhao's promotion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ies is still enlightening for thinking about how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Marxism in practice at present and in the futur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or learning from

作者简介:钟国云(1982—),男,广西荔浦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时期党史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

the ruling experience of the big and old par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P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 Dazhao; party building theory; Marxism sinicization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奠基者,有着不屈的革命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力量,有着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弥足珍贵的闪光思想,他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在中国的进步事业上树立了历史与时代的丰碑。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基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和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探究李大钊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方面的历史进程、相关贡献及其时代启示。对此进行研究,不仅是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亦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需要,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特殊的现实价值。

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思想溯源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对建党理论进行过系统阐述,有无形成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虽然看法不一,但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建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他们被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创建和建设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这是不容否定的。列宁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的继承者、发展者和实践者。因此,革命导师们在不同方面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重要的实践支撑。尽管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创建的直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1],然而从他们的经典著作和文本思想不难发现,相关论述蕴含着丰富的无产阶级政党创建思想,尤其是明确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现实必要性和时代紧迫性,深刻阐释了是否应当建党、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党以及怎样建党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内核。“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改

造资本主义社会”^[2],这对于世界各国革命斗争具有极重要的普遍性指导意义。列宁则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将无产阶级建党理论布尔什维克化,推动了建党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创新。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对建党问题的理论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最根本最直接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理论内核

考察资本主义繁盛时期的历史环境与时代条件可知,指导和帮助各国尽快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领导本国革命斗争,这是特殊时代形势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首要任务和现实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理论完整体系的构建在当时并不是第一位的,但不能因此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建党理论所做出的伟大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的核心内容,在《共产党宣言》等文献中得到集中的阐述与体现。

一是科学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地位与使命、阶级斗争基本规律、夺取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理论指导等基本理论性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是无产阶级联合的结果,是顺应和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是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必要条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3]260},这也是无产阶级自身获得解放的首要前提条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9}。马克思、恩格斯同样重视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的理论武装,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理论概括”^{[3]221},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创立的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可能。

二是深刻阐述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即使特定时期联合或者利用其他阶级的

政党,其阶级性和先进性也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4]686}。代表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行动指南,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体现出先进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并把此作为最根本的入党条件。

三是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近期和最终奋斗目标。近期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并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最终奋斗目标则是通过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产,运用一切生产工具提升生产力水平,扩大物质产品的总量,最终进入人类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奋斗目标应当走的道路和采取的策略,即坚持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兼顾的灵活革命策略,通过走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路线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

(二)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建党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在俄国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实践,列宁基于俄国国情和斗争实践进一步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党的问题,对新型政党建设理论作了系统而深入的论述,从而“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学说,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这是对俄国建党经验的科学总结与升华。

列宁提出建立秘密职业革命家组织,使之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6]257},列宁指出了秘密职业革命家组织对于推翻沙皇俄国专制统治的极端重要性,提出建立起网状般的各种中央和地方、专门和普通组织,两者共同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部分。要求革命家组织能够将分散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动力源于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而不是脱离广大群众,否则革命家就有演变

成“密谋者”和“阴谋家”的危险。“秘密的革命家组织”的提出,集中体现了列宁建党理论的时代性和世界性意义。

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重要性。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理论的基本原理,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工人阶级中先进分子的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两个决定性因素。他非常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7],“遵循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任何其他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论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8]。在革命斗争的历程与实践中,列宁坚决地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理论斗争,从而奠定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实思想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还强调了制定正确纲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并对此进行了理论阐释。列宁认为,党的纲领是统一行动和步调、应对革命斗争复杂局面与变数的关键,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党纲要反映俄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才能实现“最近目标”和“最终目标”。为此,列宁要求必须“严格地区分本质上不同的各阶段,冷静地探讨这些阶段产生的条件”^{[6]6},并在此基础上领导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同时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进行批判与斗争,从而对纲领的内容与实质进行了深刻阐释。此外,列宁通过对维克党错误路线的批判,提出了实现党纲的正确斗争原则与策略,即通过对革命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接着在工农民主专政基础上进一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此外,列宁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出俄国不具备西方的“民主”条件,整个布尔什维克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党组织才能在秘密状态下生存与发展。

二、李大钊在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

李大钊可谓是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开创者

和第一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卓越的早期领导者,其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并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经典建党理论,为党的创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也奠定了其在中共历史上“南陈北李”的崇高地位。也正是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根据近代中国时局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将具有普遍意义的建党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活学活用并进一步丰富了建党理论,成功地领导无产阶级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开创了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一)理论准备:介绍、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9]893}。李大钊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由于自幼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的腐朽与没落,国家的危亡局势激发其从小立志寻求救国之路。辛亥革命后,李大钊随即发文控诉军阀官僚的统治加深了人民痛苦和民族灾难;1913年他东渡日本留学,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了接触;1916年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以及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10]。

李大钊深受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启发,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主张和斗争的影响下,开始由民主主义者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集中研读并译著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批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接着在1918年7月至11月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主要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这在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同时,李大钊参加

《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第6卷第5号);同年底,在张申府、周作人和高一涵等人的支持下,与陈独秀合作创办了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5月1日,在《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五一杂感》,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同月5日在《晨报》副刊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历时6个多月,刊载了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部译文及其他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还刊载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传略和一些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11];除此之外,李大钊还指导和帮助北大学生创办《国民》《新潮》杂志,成为在青年群体宣传新思想的重要阵地;五四运动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新青年》上公开刊载,文章较为全面地介绍并剖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出“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12]的结论,这些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力的迅速提升。

此时,苏俄宣称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攫取的所有特权,中国民众闻此消息受到极大鼓舞,这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1919年7月和8月,李大钊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以《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适宣扬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观点进行批驳;此外,他还对盛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在北京大学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中国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阵地,聚集了大量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是,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先行者,直接影响和指引着广大进步青年的思想言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走上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这其中包括中共早期的著名活动家邓中夏、高君宇等,毛泽东、周恩来等也曾深受李大钊的影响。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引

入、传播和扩散,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

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13],李大钊早在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认为讨论中国问题务必考虑中国的国情。李大钊除了投身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扬与传播之外,还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建党实践,结合中国社会的现状,自觉对中国问题进行具体的针对性思考。1919年3月,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邓中夏的带领下,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矿山、工厂和农村进行宣讲,注重与工农群众相联系。接着,李大钊利用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等学生社团,团结和发动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在学生当中组织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讨论,阐述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14]97}。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加强了同广大进步青年的密切联系,带领他们深入工人群众了解生产生活状况,散发宣言书、发表演讲,宣传革命的理论 and 主张,以唤醒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并积聚力量,推动了中国工人罢工运动的发展。据相关统计,“1916年罢工17次,1917年罢工23次,1918年罢工30次,1919年头五个月就达19次”^[15],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培养了工人运动的领导骨干,为无产阶级政党骨干队伍的形成做了准备。

李大钊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它的实境。”^{[9]34}正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篇中指出的,“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从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论断。“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6],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作为一支

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李大钊认为中国具备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积极投身到建党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当中。1920年1月,李大钊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表达了建立劳工阶级横向联合组织的迫切期待;4月,在与张申府商议之后,回信陈独秀确定上海党组织的名称为共产党;10月,领导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担任书记,派人到长辛店深入铁路工人集中之处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工会,在实际斗争中选拔培养骨干力量并提高其阶级觉悟,吸收加入党组织;此外,他还帮助天津、太原、济南和唐山等地的先进分子开展工作,推动了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第2卷第2号上刊发《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指出“最近谈共产主义的也不少了,但是还没有强固精密的组织产生出来”^{[17]269},被认为“这是最早在中国公开号召建立共产党的一篇文章,也是证明李大钊最早提出建立共产党的客观证据”^{[14]95}。

(三)根据国情继承、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

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理论,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李大钊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建党思想。毫无疑问,李大钊的建党思想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发展进程密切相关,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建党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系列建党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第一,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回答了要不要建党的现实问题。“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使人民活不下去”^[18],针对辛亥革命后国家的危难时局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不同主张,李大钊认为中国社会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而改革成功的前提则是必须建立起无产阶级政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

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坚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9]444}。而且,“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685},李大钊在中国对这一科学论断进行开创性实践,同时强调要加强和鼓励民众运动,因为唯有“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励民众的运动,中国社会改革,才会有点希望”^{[19]78}。

第二,深刻阐述了所要成立政党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基础,回答了建立何种政党的问题。李大钊曾一度对英美政党颇为推崇,认为“英、美政治纯受政党支配,其政党都有极繁复之机关,极巧妙之组织。所以势力雄厚,直与政府并驾,甚或称第二政府”^{[19]78},认为在中国也应实行西方的政党体制等政治制度,提出“希望移植到中国来,作为改革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20]。但是,后来他对民国时期中国政坛上出现的大小各类政党却失望至极,断言“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19]78},断言难以找到能够担当中国社会改革重任的政党。李大钊基于对欧美各国与中国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状况的比较分析,明确指出了“我们现在还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政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9]444},这就规定了新型政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和工农基础,这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做出的必然选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第三,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俄共(布)为榜样,奋斗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要重视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认识工具,强调要用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党员。李大钊对布尔什维克非常认同,指出黑暗反动统治下的中国需要效法“俄罗斯共产

党”,通过“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认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7]260}。而且,李大钊也高度认同社会主义的平等、自由等特征以及追求富裕的理想和目标,认为“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应该实现那种社会主义制度”^{[9]672},从而得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结论。

此外,李大钊也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的重要性。李大钊提出,中国必须建立“坚固精密的组织”,强调其奋斗目标就是要改造强盗世界转而实行社会主义,为此需要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并进行秘密活动。由此可见,李大钊建党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是结合中国实际对经典建党理论进行的创造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建立和党纲的制定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三、李大钊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启示

以李大钊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中国化,以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为标志,创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进而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这固然有着纷繁复杂的偶然因素,但更有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顺应了世界革命的潮流大势,符合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是广大人民必然的和正确的选择,是具有普遍性世界性意义的科学真理与具有独特性的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结果,具有特殊的时代召唤性。尽管时代环境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今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和挑战,李大钊中国化无产阶级建党思想的探索与形成,对于思考新时代如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如何借鉴世界大党、

老党的执政经验教训以推进自身建设,等等,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启示和借鉴价值。

首先,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中国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和根本。

中国共产党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的挑战,如何才能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克服“四种危险”、经受“四大考验”、完成“四个伟大”,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必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丝毫不动摇,同时要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新境界,让科学的理论转化成推进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前,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大环境下,历史虚无主义、保守主义、宪政民主、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等社会思潮,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对中国极力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渗透和冲击。面对“四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只有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四个自信”,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信仰,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划清界限并展开有力的斗争,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与变化发展了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不走歪路、不走邪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坚持继承与发展创新相统一的必然要求。

其次,理论在根本上来自于实践,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理论又是认识的先导,总结经验提炼并上升为理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坚持用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治国理政的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检验、发展和创新理论以更好地推进实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宝贵的理论品质,任何时候都要大力发扬,不能抛弃。

在残酷的封建反动统治下,李大钊通过创办刊物、发表文章、思想论战、开设专栏、组织协会、深入工人当中进行宣讲等多元渠道,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众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创建的有力思想武器,进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进一步指导着党的建设与斗争。那么,结合当今中国发展的实际和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可带来很多的思考。比如,在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传媒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要利用好传统媒介的独特优势,更要善于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运用网络传媒、手机自媒体、论坛学会等,不断创新宣传的渠道和平台,适应好社会网络信息化发展的趋势,构建加强党群关系的新模式、新理论,形成新时期实施群众路线的新渠道、新途径和新平台。当今,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重大而鲜明的变化,只有注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才能不断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且,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工程项目”,不仅需要正确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图纸和顶层设计,还需要紧盯实践探索中的“工程进度”、严查“工程质量”,只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勇于创新,才能确保党建工程的高质量。

最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并结出丰硕的果实——李大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能够形成、中国共产党得以创立、中国革命事业能够不断胜利推进,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先进分子群体能够以一种开放而广阔的视野、谦虚而包容的心态,以及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与情怀,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结合中国实际灵活运用、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建党理论。

实践的发展已深刻表明,走歪路邪路没有出路,封闭僵化同样不会有出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原则和底线,同时敢于扬弃、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

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人类文明精华,真正做到为我所用。那么,在开放包容、合作竞争的当下,中国共产党更应当有开放的视野和战略的眼光,善于根据变化发展了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实际,大胆借鉴、批判吸收世界各国政党尤其是大党、老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从中发现人类政治文明共有的规律性,尤其是执政党建设的普遍规律。既要继承好中国共产党党建的优良传统和成功做法,坚持和坚守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指导地位,又要在增强党的执政意识、提升执政合法性与科学性、转变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处理好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遵循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提升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与水平。当然,学习借鉴绝不等于简单的照搬照抄,只有以我为主,博采众长、取长补短,才能坚持、完善和发展自我,才能在新时代肩负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21]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也必须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担当、胸怀与魄力。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4.
- [2] 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1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赵云献.列宁建党学说概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6.
- [6] 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
- [8]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104.
- [9] 李大钊文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0]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10.
- [11] 秦玉琴.新世纪领导干部百科全书:第6卷[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4727.
- [12] 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
- [13] 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5.
- [14] 王艳萍.李大钊与唐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 [15]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1.
- [1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 [17] 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 [19] 李大钊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0] 吴家林.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J].中共党史研究,2000(6):60-64.
- [2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

(责任编辑:夏玉玲)